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世界佛教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BUDDHISM

第十四卷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魏道儒 主编

本卷 夏德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佛教通史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BUDDHISM

第十四卷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魏道儒 主编
本卷 夏德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佛教通史·第14卷，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 夏德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 - 7 - 5161 - 7134 - 9

I. ①世… II. ①夏… III. ①佛教史—历史年表—世界
IV. ①B9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2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燕生 孙萍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33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总序

魏道儒

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一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

“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规定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

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

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

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

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至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

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

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

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

凡例

(1) 本年表始于释迦牟尼诞生，终于 20 世纪末（1999 年），内容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与佛教宗派、思潮、人物、典籍、制度、礼俗等相关的重要事件。

(2) 本年表所选取的内容主要依据《世界佛教通史》第 1—13 卷。为了既体现本部书的学术特点，又能使本年表内容相对独立完整，便于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又利用其他资料进行了必要补充。比如，从汉代到五代的中国汉传佛教部分，就参考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大事年表》，任继愈的《汉—唐佛教简明年表》，陈垣的《释氏疑年录》等进行互校增补。汉传佛教 1949 年以后大陆部分根据纪华传提供的资料并参考其他相关著作补充，台湾部分根据台湾各主要佛教机构网站资料。

(3) 本年表涉及的重要人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人物，有生卒年则均标出；第二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只在卒年条目下标出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包括年龄（大部分用虚岁汉数字表述，用周岁的地方以阿拉伯数字表述）、重要活动、著作、贡献、影响等。如果遇到同一事件、人物等的时间有不同说法的情况，或一并标出，或按本书撰写者的观点选择标出。

(4) 每一年代条目下的内容凡有明确时间顺序者，按时间顺序排列，若没有，则按古代印度、中国（以汉传、藏传和南传为序）、日本、韩国、东南亚、亚洲之外（以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为序）次序。

(5) 没有具体年代的事件，如某世纪的，放在该世纪纪年最后。

(6) 本年表涉及的月份，古代部分一律用农历。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用公历。

(7) 有些译名为了防止歧义标注了原文。

目 录

凡例	(1)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1)
后记	魏道儒 (371)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 520 年

乔达摩·悉达多诞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释迦族，为净饭王之子。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成道后被称为佛陀或佛。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立者。

约公元前 491 年

乔达摩·悉达多因看到生、老、病、死等现象，为寻求人生解脱而出家，时年 29 岁。

约公元前 485 年

乔达摩·悉达多六年苦行未获解脱，放弃苦行，到古印度菩提伽耶（今属印度比哈尔邦）一棵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坐禅 49 天，终于悟道，此即为成佛，时年 35 岁。

约公元前 485 年

释迦牟尼在鹿野苑（今属印度贝那勒斯城）向㤭陈如等五人讲说自己所悟的四谛、十二因缘等理论，佛教史称“初转法轮”。㤭陈如等五人信奉佛教成为释迦牟尼弟子，至此佛、法、僧三宝具足，标志着佛教正式成立。

约公元前 440 年

释迦牟尼弘法传教 45 年后，在拘尸那揭城（今属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附近的娑罗树林涅槃，时年 80 岁。信徒分其舍利，建塔供养。

佛涅槃不久，大弟子迦叶在阿闍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底赖雅）灵鹫山七叶窟内召集 500 比丘举行“第一次结集”，以整理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此后，富兰那长老（跋波）等率领近千名比丘在七叶窟外举行结集，世称“大众部结集”，亦称“窟外结集”“大众部小乘结集”等。

约公元前 4 世纪

耶舍长老在古印度毗舍离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普尔）召集 700 僧众举行“第二次结集”，亦称“毗舍离结集”“七百结集”。僧众因对有些戒条（“十事”）认识不同发生争论，导致僧团分裂，形成东方大众部与西方上座部。这是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分派。

约公元前 270 年

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位，王朝进入鼎盛时期。4 年后，阿育王信奉佛教，派遣僧侣四处弘法，佛教逐渐传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

约公元前 250 年

阿育王到蓝毗尼园、鹿野苑等佛教圣地朝觐，并建柱塔以纪念。最著名的有桑奇大塔等。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地兴起开凿石窟之风。

阿育王时期，因比丘大天宣扬五事，导致僧团内部发生争论。阿育王直接干预，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主持者，于华氏城（今属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召集 1000 比丘举行“第三次结集”。目犍连子帝须自撰《论事》，对当时各种异议邪说予以批驳。

此时期，大众部分裂成九部：①大众部；②一说部；③说出世部；④鸡胤部；⑤多闻部；⑥说假部；⑦制多山部；⑧西山住部；⑨东山住部。

约公元前 240 年

师子国阿努拉达普拉王朝创始人盘陀迦阿巴耶之孙提婆南毗耶帝沙建造都波罗摩塔。塔中供养佛陀的锁骨舍利。

公元前 232 年

阿育王之子玛亨德长老和兰卡（今斯里兰卡）比丘一起在塔寺举行了一次巴利三藏结集（“大史”称之为第四次结集），历时十个月完成，由国王天爱帝须护法。这时阿利咤等兰卡僧人早已开始独立说法传戒，兰卡城乡各地佛教也已经普及。

公元前 2 世纪

西北印度弥兰陀国王与佛教关系密切，在巴利语的《弥兰陀王问经》以及该经的汉文异译本《那先比丘经》中，叙述了弥兰陀王敬服并皈依佛教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教理传入在亚洲的希腊人之中。

佛教从古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等地越过葱岭向西域各地传播。

巴伽石窟开凿。

卡尔利石窟开凿。

阿玛拉瓦蒂大塔建造。

阿旃陀石窟开凿。

约公元前 187 年

古印度中部巽迦王朝补砂密多罗国王即位，他以婆罗门为国师，推行排佛政策，摧毁境内佛塔，尽杀僧尼，史称“中印度法难”。

菩提伽耶大塔、巴尔胡特（Bharhut）大塔建造。佛陀伽耶围栏雕刻完成。

公元前 138 年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后张骞又于元狩四年（前 119）再度出使，疏通了汉朝远达西亚以外的西域交通。从此以后，汉王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佛教最初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今天的新疆某些地区，然后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

公元前 124—前 70 年

早期安达罗王朝（萨塔瓦哈纳王朝）桑奇大塔塔门雕刻完成。